

从干旱地区的特点出发 探索发展旱作农业的途径

中共延安地委 延安地区行署

一

延安地区位于黄河中游，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全区共辖13个县、一个市，总面积3.8万多平方公里，折合5,700多万亩。在总面积中，有森林1,930多万亩，占33%；草坡2,000万亩，占34%；耕地565万亩，占10%（其中川、原地约占30%）。年平均降雨量500多毫米，北部只有400多毫米，无霜期平均176天，最短的100天左右，属于半干旱气候。农作物多是一年一熟，除南部原区适宜种小麦、油菜外，大部分地区只宜种糜谷、玉米、豆类、洋芋等秋杂粮。

建国以来，延安的各项建设事业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左”的路线干扰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加之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群众的温饱问题未能得到解决，仍然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1973年周总理来延安时，了解到这种情况，感到痛心，流了泪。许多曾在延安战斗过的老同志也为之不安。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经济建设和群众生活都出现了日益发展的新局面。

1.在经济方面，农业稳定增长，工业扭亏为盈，财政收入连年上升。1982年同1978年相比，农业总产值由2.67亿多元，增加到3.44亿多元，增长28.6%，年递增6.5%；粮食总产量1978年为8.5亿多斤，1980年达到10.4亿多斤，1982年在1/4地区遭受严重旱、冻灾害情况下，总产仍达到9.4亿多斤，比1978年增长10.7%，其中夏粮增长72.8%；多种经营总收入由5,086万元，每人平均37元，增加到1.15亿多元，每人平均81元，增长了1.26倍。工业经过调整，初步形成了“北油、南煤、中轻纺”的合理布局，扭转了连续10年的亏损局面，总产值由1.37亿多元，增加到1.64亿多元，增长20%；财政收入由2,615万元增加到5,354万元，增长了1.05倍。

2.在群众生活方面，持续多年的愁吃愁穿，变成了现在的丰衣足食，大多数农户实现了耕三余一，约有1/5左右的农户开始富裕起来。1970—1978年，全区社员平均口粮每年只有350斤上下，近半数的社员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光景。从1980年起，全区社员口粮平均保持在500斤以上，1982年产粮超万斤的3,620户，向国家售粮上万斤的107户。社员收入（含自营收入）由1978年的每人平均98.8元，提高到1982年的140.17元，增长42%。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民的住、穿、用和购买力的水平不断提高。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每人平均年购买商品额为80元，近两年超过100元。过去山沟里

很少有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几大件，现在普遍增加。据统计，4年中全区社员新建房窑35万间（孔），有40%左右的社员迁入新居。还兴建改水、饮水工程2,700多处，使高山、旱原和地方病区的45.3万多群众的饮水困难得到基本解决，加上药物治疗和卫生条件的改善，长期蔓延的克山病、大骨节、甲状腺肿大和氟中毒等四大地方病也基本控制。

3. 在生态环境方面，多年沿袭广种薄收所导致的“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开始转向良性循环转变。4年中，全区综合治理面积1,340平方公里，年治理速度为过去的2.5倍，累计治理面积达到5,210平方公里，占全区总流失面积的17.3%。输入黄河的泥沙量已开始减少，据测算，每年可拦截输沙总量的21%。几条主要河流输沙量均有减少，延河、清涧河各减少12%以上，洛河减少7.8%。

二

我区农业生产所以有这些变化，最根本的是由于贯彻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农村政策，克服了多年来破坏生产力的“大、公、平”，普遍推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国家在财力、物力等方面的大力支援，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还逐步探索了一条适应干旱山区特点的发展农业的路子。这条路子就是从过去在发展灌溉农业上找出路，转为主要搞旱作农业。我们的做法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转变上：

（一）由单纯搞农田水利等工程措施转为林、草、田、水综合治理，逐步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

延安地区是黄河中游水土保持重点地区之一。区内丘陵起伏，沟壑纵横，植被很差，水土流失面积达3.0万多平方公里，占总土地面积的79%，每平方公里侵蚀模数7,644吨，每年入黄泥沙2.29亿吨。北部丘陵沟壑区的吴旗、志丹、安塞、子长等县侵蚀模数高达1.8万多吨，平均每亩12.5吨，每年冲刷土壤约1—2厘米。这种严重水土流失的状况是造成多年来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的致命因素。建国以后，广大干部和群众为改变这种状况，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修水利、建水库、大搞“四田”（水地、埝地、梯田、坝地）建设，对控制水土流失、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们在指导思想受“左”的影响，重水利，轻水土保持，重工程措施，轻生物措施，把主要力量放在打坝修渠，特别是水利工程上，总想在干旱山区走出一条“水”路来。加之许多工程不搞设计，不讲质量，经不住较大洪水的袭击，仅1977年7月一次洪水灾害，全区就冲毁水库9座，淤地坝393座。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不仅没有达到根治水土流失、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而且在财力、物力、人力上都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认真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措施都进行了大的转变：由偏重于工程措施，转为同时大抓生物措施；由分散治理发展到一架山、一面坡、一条沟地按流域、按山系集中连片治理；由只强调栽树忽视种草，转变为乔（木）、灌（木）、草一齐上；由注重治理转向防治并重，加强法制，保护水土草木资源；由单纯依靠人工治理，转到同时采用新技术、新机具，加快治理速度。在统一规划、统一标准下，规定

每个劳力每年承担农业基本建设工30—40个，把治理任务包到社、队、户、劳，实行联队、联户和分户治理。这样综合治理的好处是：

1、坚持以“四田”为基础发展粮食生产，为变广种薄收为少种多收，有计划地退耕还林还牧创造了条件。从1979—1982年，全区新修和加工提高的基本农田36.19万亩，连前累计每人平均达到1.75亩（其中水坝地0.53）。全区“四田”占总耕地面积的45%，而每年从“四田”中拿回的产量占粮食总产的60%以上，使农民有了比较稳定的口粮基地，使退耕还林种草、大上生物措施有了可能。地处严重水土流失区的延安市李渠公社，过去喊了多年少种多收，但地总是退不下来，原因就在于吃饭问题没有保障。1973年以来，他们共修水坝地和梯田1.7万多亩，每人平均2.2亩，到1982年耕地面积较1978年前减少1/3，退耕3万多亩还林还牧，而粮食产量却增加了1.25倍，每人平均生产粮连续4年稳定在1,200斤以上。

2、把治表 and 治本、当年生产和长远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逐步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的基本条件，促进恶性循环向良性循环转变，实现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如延安市碾庄沟流域，面积为54平方公里，先后打坝189座，修梯田和坝地6,700多亩，每人平均1.9亩，同时植树、种草3.4万多亩，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的治理面积达到50.7%，既解决了吃饭和花钱问题（1982年全流域每人平均生产粮1,000斤，收入216元），又基本上做到了“小水不下山，泥沙不出沟”，起到了“工程养生物，生物保工程”的作用。

3、投资小，周期短，见效快。4年中，全区造林282.9万亩，等于建国后至1978年累计造林保留面积的1.47倍；人工种草174万亩，每人平均1亩多；在稀疏林区和河源区飞播油松、沙打旺等优质林草79万亩；小流域治理由1930年的17条发展到1982年的253条，当年就治理了702平方公里，等于建国以来全区年平均治理142平方公里的5倍，而投资减少了1/3。从1978年开始规划治理的安塞县王家湾、县南沟两条流域，4年治理程度达到47.2%，每亩平均投资只有4.13元，比过去单靠工程措施的投资大大减少。

4、由于林草面积不断扩大，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治山治水又治穷，一举多得。地处延安地区北部山区的王家湾公社，平均年降雨量只有200—300毫米，过去群众吃饭、燃料、花钱都十分困难。近几年，他们把荒山荒坡划给社员，至1982年底共种柠条3.66万多亩，每人平均7亩多，初步解决了群众的燃料困难，大家畜也由1978年的900头增加到1982年的1,550头，羊子发展到9,000多只。

（二）由广种粗作转向“四法”种植，努力解决“薄、粗、旱”的问题

由于长期水土流失，延安地区土壤有机质很低，就是条件较好的南部原区，土壤耕作层有机质养分也只有0.7—0.8%，北部和东部仅0.4—0.5%，尤其是作物生长所必需的有效氮、磷养分奇缺，均为全国、全省的最低水平。加之耕作粗放和频繁的干旱等自然灾害影响，粮食产量长期低而不稳。从1949—1978年的30年中，有15年平均亩产不上100斤，其中坡耕地一般只有40—50斤。多年来，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我们下了很大功夫，但由于方法不当，路子不对，没有抓住主要矛盾，结果事倍功半，收效甚微。影响延安地区粮食生产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过去总以为是“旱、粗、薄”，把“旱”字放在第一位，好象不兴修水利就毫无办法。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认真总结了多年来的生产实践，

认识有了变化，把这三个字颠倒过来，努力解决“薄、粗、旱”的问题，下功夫培肥地力，改革耕作技术，搞好蓄水保墒，因地制宜地在全区推广了适应干旱山区的“四法”种田：

1、山地水平沟种植法，它适用于 25° 以下的山坡地，宜种糜谷、小麦、豆类、洋芋等作物，基本操作方法是沿山坡等高线用山地犁开沟，沟深2.7—3.5厘米，幅宽5—7厘米；

2、垄沟种植法，主要适宜于川、原、坝等平地种植玉米、高粱等高秆作物，种植糜谷、薯类等秋杂作物也有好的增产效果；

3、油、豆、草肥田轮作法，实行种地和养地相结合；

4、间作套种法，川水地以夏秋间套为主，原面旱地以秋秋间套为主。

采用这些耕作方法，增产效果十分显著。全区从1979年开始大面积推广，到1982年“四法”种植面积达到264万亩，占粮田总面积的50%。凡实行“四法”种植的作物，一般都比原来增产30—50%，配套技术好的可增产1—2倍。全区每年靠“四法”净增粮食约1亿斤左右。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大面积高产社队，无一不是全面应用“四法”种植取得的。推广“四法”种植较早的延安市，连续5年粮食总产超过1亿斤，比大面积推广前增产3,000万斤。南部高原沟壑区的富县、洛川、黄陵等县，近几年由于大面积推广油豆草肥田，加上深翻改土、精耕细作、使用良种和施肥方法上的“一炮轰”，出现了旱原小麦平均亩产200斤的县、300斤的公社、400斤的大队、600斤的生产队和800斤的田块。北部山地水平沟增产效果更为显著，列为全区36个穷社之一的志丹县杏河公社，从1980年大面积推广水平沟种植，连续3年粮食总产达到800万斤以上，每人平均生产粮1,200斤以上，均比1979年增长1.5倍。

“四法”，特别是山地水平沟种植法，不仅是提高粮食产量的重要途径，也是蓄水保土的有效措施。它的好处有三点：

一是可以加深耕作层，拦截径流，减少土壤冲刷，起到保水、保土、保肥、保墒和抗旱、抗寒、抗倒伏的作用。据有关部门测定，当坡面小于 20° 以下时，在普通降雨情况下，水平沟与平作比较，径流减少80%左右，土壤冲刷减少90%左右。另外，全区降雨量多集中在8、9月份，采用水平沟耕作法，大大提高了蓄水保墒能力，使秋雨春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春旱的矛盾。

二是水平沟耕作本身要求质量标准化、操作系列化、实施规范化、管理科学化，这就把传统农业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使氮磷配合、集中施肥、选用良种、合理密植、药剂拌种、采用条播等增产措施得到了广泛综合应用。

三是这种耕作方法投资小，办法简单，农民容易掌握。同时，当年搞当年见效，普及推广比较快。

(三) 由单一抓粮食生产转到同时抓多种经营，按照干旱山区特点调整农业经济结构

延安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发展林业、牧业和其它多种经营生产的潜力很大。可是，过去却丢开这些优势，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甚至毁林开荒，垦草种粮，使优势变成了劣势。三中全会后，我们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认真调整农业结构，

因地制宜地开展多种经营，使长期以来农、林、牧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开始向合理的方向转变：

一是利用户阔的土地资源，积极发展多种种植业。过去我们在种植业上单一发展高产禾本科作物，不适当地压缩豆类和经济作物。1979年以后，大量发展了适宜本地种植的小杂粮和经济作物，如名贵杂豆、糜谷、荞麦、油菜、小麻籽、蓖麻、洋芋、打瓜、烤烟等。这些作物耐旱耐瘠薄，生长期短，收成比较稳定，经济价值大，有的还可以养地。全区去年豆类、油料和其它经济作物面积达到72万亩，比1978年增加18万亩。4年共生产豆类1.5亿斤，油料8,098万斤，近两年群众向国家交售大豆3,770万斤，油料2,632万斤，仅这两项每人平均增加收入15元。

二是利用草山草坡优势，大力发展以草食牲畜为主的畜牧饲养业。全区有2,000多万亩草坡，群众历来就有养畜习惯。过去由于丢开这个特点，也象其它地方一样单一强调养猪，致使大家畜和羊处于下降趋势。近几年随着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畜牧业，特别是社员家庭饲养业，得到较快地恢复和发展。1982年全区畜牧业产值达4,689万元，比1978年增长80.5%，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9.7%提高到13.6%；出现了养殖业的重点户、专业户1.66万多户，这些户仅畜产品收入达195万多元，每户平均117元。全区大家畜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达到31.8万头，每户平均1.08头。细毛羊和白绒山羊等优良羊种已发展到29万多只，每户平均1只。畜牧业发展较快的志丹县，目前“两户”已达4,000户，占全县总农户的26.3%，其中以养大家畜为主的2,357户，养大家畜1.26万多头，每户平均5.4头；以养羊为主的1,643户，养羊9.99万多只，每户平均61只。

三是依靠群众发展林业。延安地区大部分地方人稀地广，宜林荒山荒坡面积大。从过去30多年的实践看，发展国营林、集体林是需要的，但由于力量有限，进展缓慢，而且投资大，效益不高。切实可行的出路，就是依靠千家万户，大搞开发性承包。这样做，不仅投资小，进展快，而且质量好，效益高。1979年以来，全区共给18万多户社员划拨自留山72.77万亩，现已造林53万多亩，每户平均2.9亩；并将192万亩集体成片林，包到场、组、户管护，作为责任山，采伐权归集体，收益分成；对边远荒山，开始采取联户或以户承包，并从资金、种苗、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持鼓励。同时，还根据本区的南部和黄河沿岸地区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地发展了一批以经济林木为重点的多种经营基地。如宜君的核桃、酸枣，黄龙的板栗，洛川、富县、宜川等县的苹果和泡桐，延川的红枣，子长的蚕桑，志丹、吴旗的山桃、山杏等，均已初具规模，并形成一定生产能力。以洛川县为例，现有苹果园600多个，总面积4万多亩，已挂果2万多亩，1982年总产达到160多万斤，收入314万元。这个县的苹果，不仅在省内外享有一定声誉，而且进入国际市场。在南部，有次生林1.6万多亩，我们组织林区社员开展了抚育改造，林副土特产品的采集和加工利用。这些以林、牧业为主的多种经营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也为发展旱作农业提供了资金。

三

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在发展农业生产上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之所以见效较快，收益

较大，我们体会，主要是在指导思想确立了这样几个观点：

一是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过去我们也讲从实际出发，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却离开了本地的自然特点。延安地区的自然特点是：第一、山坡地多，川、原地少，称作“一川二原七分坡坡田”；第二、干旱缺水，全区水资源只有15.6亿立方米，每亩耕地平均有水量仅是全省的31%，全国的13%。这两条固有的基本特点，本来是只能适应而难以改造的，可是，我们过去由于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总想把这些基本自然特点改变过来。不少地方不顾条件地修水库，筑水渠，改河造田，引水上山等，结果投资很大，收益很差，花了不少冤枉钱，吃了不少苦头。三中全会以后，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通过总结经验，重新认识本地区的自然特点，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过去那种“硬走水路”的做法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历史的教训和许多典型经验使我们逐渐认识到，发展延安地区的农业生产，主要应当走旱作道路。修建“四田”，推广“四法”，深翻改土，蓄水保墒，种植抗旱作物品种，以及施肥上的“一炮轰”等，都是发展旱作农业的好措施。这条路子是在“水路不通”的情况下走出来的，原来我们并没有完全认识，今年赵总理来延安视察工作时，对旱作农业所作的精辟分析和科学论证，才使我们的认识得到了从感性到理性、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飞跃。

二是经济效益的观点。搞农业必须讲经济效益。可是，过去我们在这方面考虑得不多。在所谓“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错误思想影响下，干了许多大投资、小效益，高投入、低产出，甚至盲目蛮干，有投入无产出，劳民伤财的蠢事。比如，硬要在干旱山区“走水路”的实践，就有着深刻的教训。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到一些修了不久就报废了的“水库”，筑成后没流过水的“环山渠道”和不能利用的“小高抽”、“大高抽”。不少“高产穷队”的出现，也是不讲经济效益的产物。延安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党和国家出于对老区人民的关怀，在财力、物力上都给予不少支援。从1978年以后，中央又决定每年给陕北固定无偿投资5,000万元，分给我们地区2,000万元左右。我们用这些援建资金，进行林、草、田、水综合治理，改善生态环境，改变生产的基本条件，搞农业技术改造，推广“四法”种田等，用较小投资，取得了较大效益。根据我们的体会，要用好国家援建资金，第一、路子要对，这对经济效益的大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花每一笔钱，采取每一项措施，搞每一项工程，都要和实际相结合，和效益相联系，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第二、办法要准，对所采取的重大措施和建设项目，要有科学的态度，不能凭想当然办事，“拍板”前，必须进行可行性研究，尊重专家们的意见，选择最佳方案；第三、重点要突出，不撒胡椒面，把钢用在“刀刃”上；第四，要与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相结合，国家的支援，应重点放在发展生产所必需而群众又无力办到的事情上。

三是靠科学技术的观点。家庭承包责任制普遍实行后，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出现了学科学、用科学热潮。在这种情况下，地委、行署从1981年开始，注意引导群众从习惯于广种打粮转到搞科学种田上来，大力推广“四法”种田。我们体会，在全区抓科学种田，用少种多收去代替广种薄收，不只是增产粮食的问题，而且对改善生态环境具有战略意义。多年的经验证明，没有充足的粮食，农民吃不饱饭，山区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要解决粮食问题，正确的办法就是靠科学技术提高单产，使一亩地收回二

三亩、三四亩地的粮食。这样才可以把大批山地退下来，种树种草，建立良性的生态环境。赵总理要求我们：“要在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的中转点上下功夫”。“中转点”是什么？按我们的理解，就是抓“四法”种田，变广种薄收为少种多收。在靠科学、用科学上，我们主要抓了三点：第一、各级领导首先在思想上要真正重视科学，重视技术，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不解决这个问题，靠科学就是空话；第二、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人员的作用，鼓励他们为发展全区旱作农业献计献策，贡献力量。被群众称为“姚科学”的农艺师姚代明，在总结推广水平沟和垄沟种植法上做出了成绩。高级农艺师李喜彦，长期从事小麦育种，先后培育了十多个优良品种，尤以延安“15号”适应性广，目前推广面积已达30多万亩。黄陵县农技干部杨贵本，通过解决“薄、粗、旱”的问题，探索旱作农业的路子，创造了小麦高产的典型。还有从事果树栽培研究的郑彦永，蔬菜栽培研究的卜崇周，被群众称作“油神”的油菜技术员安永福等，都为我区农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三、狠抓农业科技的推广工作。为把已有的农业科技成果和典型经验推广开来，近几年，从地到县都围绕“四法”种田的课题，对8万多名基层干部、农民进行了技术培训，有361名科技人员与农民签订了技术联产合同，建立了1.6万多个农业科技户，对普及科技知识、提高农村科学技术水平、落实科学种田措施起了重要作用。

四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观点。近几年来，我们比较注意记取过去搞“一刀切”的教训，制订每一个计划，落实每一个措施，提出每一个要求，都考虑到南部原区与南部山区，林区与非林区及人口密度大与小的差别，即使同一类区，也照顾到其它因素的异差。依照农业区划，实行分类指导，不搞千篇一律，这也应当成为指导农业的一条重要的思想原则。

四

三中全会以来，延安地区的经济形势虽然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但由于底子薄、基础差，还未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局面，还有14%的农户生活仍然较困难。我们在改革耕作技术、发展旱作农业方面，虽然做了一些探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只是开始，还在继续摸索之中，许多问题有待继续研究和解决，许多做法还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考证和完善。我们对今后的经济建设和逐步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虽然有了初步的打算和设想，但要真正变为现实，还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我们一定要贯彻赵总理对延安工作的指示，按照这次会议的精神和各地的先进经验，从发展旱作农业的战略目标出发，在当前和今后几年内，主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紧紧抓住“薄、粗、旱”这个主要矛盾，以政策为保证，以“四田”作基础，狠抓“四法”种植这个关键环节，在粮食自给有余的同时，使多种经营有一个较大发展。到1985年全区基本农田和“四法”种植面积各达到300万亩，多种经营专业户、重点户达到8万户，每人平均生产粮食稳定在850斤以上，收入达到220元，使农村面貌出现新的变化。

二是进一步加快林草建设步伐，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引导和组织全区140多万农民在3.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放开手脚进行开发和治理，让荒山、荒坡、（下转第9页）

姓。我说这一条是最过硬的。说一千道一万，抵不上干部带头干。种一亩苜蓿草有什么难？无非是多流点汗。二亩实在完不成，就种一亩；一亩完不成，种半亩。不但地方上的同志要这样，中央农牧渔业部的同志们也应当带头干。你一年种几棵树，并且交上5元钱给老乡，说老乡呀，我帮你种上树，还送给你几块钱请你照看，树长大了归你，行不行？我这只是打个比方。我的中心意思是，要拨乱反正、开创局面，我们必须带头干。不带头干没有说服力，不能感动上帝——感动人民。这一条我把它看得非常重要。煤炭部干了个好事，我去年同他们谈了之后，他们发了个通知，煤炭部系统干部，从部长起，一年带头劳动多少天。高扬文同志从去年开始，每年下井两个礼拜，同时对各级干部都有规定。既然我们现在说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是关系子孙后代的大事，我看我们大家也要带头干，搞责任制。1956年我来延安开造林大会，事先想好了，光开会有什么用，大家把树苗带来，自己动手，在杨家岭、宝塔山和大砭沟，一共造了3片林。只开会，君子动口不动手，那是孔老二的办法。共产党员应当既动口又动手，才叫真功夫。

最后一条，决心要持久。最重要的是这一条。我上面讲了，要把干旱区改造过来，10年是不行，20年看行不行，有的地方要30年，有的还要40年。这个怕什么，还是要靠愚公移山，这代人搞不完，下一代，一代两代搞不完，还有第三代。大概陕西有两代人就差不多了，甘肃恐怕得三代人，新疆三代人不够就四代，下他个决心！1945年在杨家岭开七大，毛主席最后讲了愚公移山。我们现在也叫愚公，我们不讲挖山，而是治山；绿化祖国，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要硬下这个决心，要想到这件事干得怎么样，不是小问题，而是对不对得起党，对不对得起人民，对不对得起已经去世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对不对得起后代子孙的大问题。我们想清楚了，就下决心干到底！我相信同志们都是久经考验的党员，来延安开会，叫北方旱地农业工作会议，没有辜负此行，没有辜负看到了杨家岭、枣园。这叫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你们努力，我们也努力，大家都努力，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干好，一定能够干好！

（注）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3页。

（上接第16页）荒沟、荒滩、荒水为民造福兴利，每年争取实现两个100万，即造100万亩林，种100万亩草，1985年造林累计面积达到600万亩，种草保留面积达到300万亩，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7,200平方公里，使治理面积占到流失总面积的24%。

三是努力把现有的典型经验推广到面上去，逐步使这些先进水平变为全区的社会水平，并不断创造新的水平。

四是加强智力开发和投资。在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同时，办好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开展各种专业技术培训活动，争取每年培训基层干部和农民10万人左右。

五是改进领导作风，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一项一项地抓，一块一块地搞，做到干一项，成一项，搞一块，上一块。我们决心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把革命圣地延安建设好。